

评
《
红
楼
梦
》

续集

7.411

封面设计：梁步麒

172

评《红楼梦》
续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字数：120千字

1974年8月第1版 1974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册

书号：10088·489 定价：0.42元

目 录

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

.....徐绎熙（1）

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曹雪芹

.....文 雷（10）

《红楼梦》一书产生的历史时代

.....北京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傅祥萍等（38）

《红楼梦》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李 晖（51）

《红楼梦》的反儒倾向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评论组（69）

《红楼梦》的反孔学精神

.....刘梦溪（82）

“大有大的难处”

——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

.....方岩梁（95）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翟青 史洛（108）

大观园里奴隶们的反抗斗争

.....燕 枫（117）

封建末世的孔老二

——《红楼梦》里的贾政……………梁效（139）

评薛宝钗“装愚守拙”的处世哲学

……………严嘉良（151）

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李春光（158）

林彪一伙为什么欣赏平儿

……………严嘉良（168）

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

徐 缄 熙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它通过四大封建家族的兴衰史，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揭露了腐朽的封建阶级的反动本质、内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可以作为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借鉴。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要真正读通这部小说，又必须深刻地理解现时代的阶级斗争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并且“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鲁迅积累起极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在世界观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因此，他对《红楼梦》这部政治小说有着十分深刻的见解和精辟的分析，而且随着他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认识的深化和思想上的飞跃而日益加深。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论，不但见之于《中国小说史略》等辉煌的专著，而且见之于鲁迅的许多杂文。特别是他

后期的杂文，把对《红楼梦》的见解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鞭辟入里，一针见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这使我们鲜明地感觉到鲁迅读《红楼梦》是为了总结历史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性，以提高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并用来为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服务。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也就特别富于战斗性。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写的一篇题为《言论自由的界限》的杂文，就是一个范例。

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杂文，严厉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忠实走狗“新月派”反动文人。文章从《红楼梦》里一段著名的故事讲起：贾府的奴才焦大，仗着酒醉骂了主子和别的奴才，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对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

这种不争气的主子和忠心的奴才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在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是常见的现象。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就常演出类似的丑剧。一九三一年七月，“新月派”的北京新月书店分店一度遭查抄以及《新月》月刊的被没收，就是一例。鲁迅在这里正是带着几分幽默地把焦大同“新月派”加以对照。

“新月派”反动文人以胡适、梁实秋之流为代表，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忠实走狗。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卖身投靠国民党反动政府，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战线猖狂进攻。这些“丧家的乏走狗”对国民党反动派竭忠尽

智，不遗余力。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胡适在《〈人权论集〉小序》中说了一个“鹦鹉救火”的故事：陀山起了大火，侨居山中的鹦鹉“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对她们说，你们这点水，又能起什么作用？鹦鹉说，因为住在这座山里，不忍看到它被火烧掉。这只故事不打自招地道出了胡适一伙向主子表白忠心的奴才心理。他们以鹦鹉自命，眼看革命的烈火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遍地燃烧，形成了一片燎原之势，真是五内如焚。因此，虽然“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也要尽他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这样的忠心耿耿，主子理应优礼有加，另眼相看。谁知竟也跟着“遭殃”，这可实在是冤哉枉也了。其实呢，说怪也不怪。原来他们也象焦大一样，对主子有了一点“微词”。胡适一伙是连焦大“仗着酒醉”骂人的勇气也没有的。他们冲着主子汪汪几声，正如鲁迅指出的：“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神经十分脆弱，就连这点子“微词”也被认为是超越了主子所许可的“界限”，结果“新月派”的君子们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象焦大一样地被塞进了一嘴马粪。

焦大的遭遇和“新月派”的遭遇，一个发生在封建社会，一个发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却颇有共同的特点。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就是一个贾府，它们都是反动的没落阶级，都处在“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世”，都是“外面的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纸老虎；而“新月派”就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焦大的角色。

贾府的主子们不能容忍焦大的骂，国民党反动派连胡适一伙那点子“微词”也受不了，他们都是那样地虚弱，经不起一点儿风吹草动。但是，胡适一伙的被塞上一嘴马粪，却又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叭儿狗也“革命”起来了。这伙政治骗子乘机挥舞起了“言论自由”的旗帜，以掩盖其地主买办阶级忠实走狗的真面目。他们虽然也是“现在的屠杀者”，却比那些挥舞屠刀的刽子手更有欺骗性。正是针对这一点，鲁迅以洞幽烛隐的眼光和笔锋，看穿了并揭露了胡适一伙与焦大的“相类的境遇”和共同的本质。他辛辣地指出“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所以只要新月社“辨明心迹”，“马粪”也就立即换成“甜头”了。这就无情地撕下了胡适一伙用来欺骗人民的假面具，从而教育与鼓舞革命人民与这一伙政治骗子及其反动主子作坚决的斗争。

在鲁迅的杂文中，准确而生动地运用读《红楼梦》得来的体会，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例子很多。他在同“新月派”以及所谓的“第三种人”作斗争的时候，曾经用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例子，形象而通俗地说明了人的阶级性和文学的阶级性，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九三三年八月，买办文人林语堂写了一篇题为《让娘儿们干一下吧！》的文章，大放厥辞，说什么当时的世界裁军会议、世界经济会议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世界是由男子统治着的，而男子又是生性爱打仗的，这就使世界陷入了战火连绵不断的“一团糟”的命运。为此，这个“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

恩”，建议“把世界的政权交给娘儿们去”。鲁迅一看到这篇黑文，就立即针锋相对写了一篇题为《娘儿们也不行》的杂文，文中引用了林黛玉的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语中的地指出：“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内战”，就是阶级斗争。整个现实世界，同大观园里一样，“女界”也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且，贾府的那些女主子们，“一个个不象鸟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哪一天不在进行激烈的“战争”？鲁迅深刻地指出了世界之所以有战争，决非是“由于男子爱打仗”，而是因为存在着剥削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什么裁军会议等等，都无非是一种骗局。帝国主义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林语堂一向信奉中庸之道，以孔子之徒自命。鲁迅尖锐地讽刺这类骗子手“东风吹来往西倒，西风吹来往东倒”，而实际上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子“治天下”的时候，是“把人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的。

从上述的许多例子可以看出，鲁迅对《红楼梦》的分析之所以如此精当，是因为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一犀利无比的解剖刀，剖析一切处于没落时期的反动剥削阶级的共同特点，并把这部小说作为一面镜子，照见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和鬼蜮伎俩。正因为鲁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读《红楼梦》的，因此能够得出任何地主资产阶级“红学家”所不能得出的科学的结论。他在这部小说中所见到的，不是什么“吊膀子”，而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就说过：“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见

解。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一讲起贾宝玉，总是津津乐道他的缠绵的爱情，以此抹煞《红楼梦》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而鲁迅则看到，贾宝玉生活于其中的大观园，整个封建社会以及整个旧世界，都是他在《狂人日记》中所揭露的人吃人的世界。就在宝玉的眼下，几十条人命，一个又一个被抬上了“人肉筵席”。这里有封建阶级的叛逆者，更多的是不甘于奴役和压迫的奴婢。什么孔孟之道，全是吃人之道。什么仁义道德，全是吃人的道德。一张“护身符”所反映的地主阶级的政治，还不就是吃人的政治！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愈是临近死亡，也就愈要倒行逆施，它们的内部矛盾和政治、经济的危机也就愈是深重。“许多死亡”，正暴露出这种矛盾和危机的深刻程度；而贾宝玉也正是从“许多死亡”中，感觉到了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无可挽回的必然崩溃的命运。正如鲁迅所说的：“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贾宝玉之终于叛逆而去，也正是封建阶级分崩离析、行将灭亡的一个标志。

对于《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地写出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日益深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鲁迅是充分肯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鲁迅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价值：“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传统思想”，我们对照《论睁了眼看》这篇杂文就可以知道，鲁迅所指的正是孔孟之道。他在这篇杂文中说道：“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

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一切腐朽的垂死的反动阶级，都丧失了正视现实、正视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勇气，它们也就靠那“非礼勿视”的孔孟之道来“瞒和骗”。对于孔孟之道这种“瞒和骗”，鲁迅是深恶痛绝的。就是在这篇杂文中，鲁迅不但彻底否定了那些“闭眼胡说一通”的《红楼梦》的续作，而且也批评了高鹗的续书。因为后者也让“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猩猩毡斗篷的和尚”。鲁迅幽默地说：“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对高鹗的续书，鲁迅并不完全否定，但上述的那些描写，显然不合曹雪芹的原意，也是孔孟之道的“瞒和骗”的流毒。而曹雪芹的可贵，正在于他敢于冲破这“瞒和骗”的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给了贾府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历史结局。鲁迅也正是通过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封建家族的“聚散之迹”中，看到了适用于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普遍的、典型的意义。

鲁迅说过：“《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这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切反动没落阶级，都具有规律性。鲁迅尖锐地批判了胡适的所谓“自传说”：“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读《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雪芹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自传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红楼梦》的主题和形象的阶级内容及其普遍的社会意义。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作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红楼

梦》决不是作者自己及其一家人的画像，而是对处于“末世”的封建社会和封建阶级的深刻写照。贾宝玉、林黛玉也好，贾政、王熙凤、贾雨村、薛宝钗也好，都是阶级的典型。书中所描写的四大封建家族及其兴衰演变，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整个封建阶级的腐朽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包括今天的苏修美帝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某些本质特点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鲁迅也正因为认识到《红楼梦》的典型意义，所以他才能那样准确而又巧妙地运用他对《红楼梦》的分析，切中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对《红楼梦》的评论，从来就是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也总是根据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去歪曲和利用《红楼梦》，以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路线的。正如鲁迅指出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否认《红楼梦》是政治小说，似乎是不讲政治的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罢了。“考证”出《红楼梦》不过是作者的“自叙传”的胡适，不就赤裸裸地宣称他的所谓“考证”，“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免得青年们“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吗？他是在“考证”的幌子下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作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刘少奇、林彪这伙修正主义者也读《红楼梦》，为的是“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眼就看中了《红楼梦》一百零五回，

对贾雨村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所使用的那套孔孟的处世哲学心领神会，立即据以总结出搞阴谋诡计的反革命经验，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是多么明确！

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体现着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彻底革命精神。他不但批判了旧红学，而且同所谓的新红学，即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作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的战斗的传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来阅读和评论《红楼梦》，以利于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原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6期）

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

——曹 雪 芹

文 雷

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政治历史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它是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一部伟大作品。《红楼梦》高度的艺术成就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表明，曹雪芹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

《红楼梦》原作流传下来的，只有前八十回，这是研究评价作者思想的主要材料。除此以外，近年来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对于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变化，有很大的帮助。本文根据《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废艺斋集稿》残存部分，对曹雪芹的思想，作些不成熟的探讨和评价。

(一)

曹雪芹生活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末世”。从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孔子，到猛烈地冲击封建制的思想家——曹雪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老天拔

地，快进棺材了。“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就是这个垂死的封建制度的形象写照。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在农民起义和市民运动的风暴打击下，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地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分化出一小批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的叛逆者来。曹雪芹就是这样一个反封建的思想家。一部《红楼梦》，渗透了反抗整个封建社会的叛逆精神，闪耀着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

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主要是孔丘创立的儒家学说。这种所谓“用世”的思想，比较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和强化统治阶级的权威。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道德规范。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政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男权）这三条绳索。佛道两家的学说，都是所谓“出世”的思想，那不过是把人间的三纲——君权、父权、夫权，转移到天国和地狱里去就是了。他们各自捏造出许多牛鬼蛇神，妄图用这种宗教迷信中的鬼神的权威，来麻醉人民，巩固封建统治。在《红楼梦》中，人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这四条极大的绳索，有形无形地束缚着人民群众。曹雪芹在书中批判了反动的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对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这种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是保护

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十分典型的封建贵族集团，可以当作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缩影来看。四大家族互相勾结，上自朝廷，中及州县，下到乡村，都有他们的人。这个封建性的独立王国，在家族内部实行森严的宗法统治，在社会上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书中以四大家族为中心，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罪恶统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第四回写《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问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通过贾雨村乱判人命案这个事例，就可以一眼看穿了。原来当时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护官符”，上面写着“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族名宦土豪劣绅的名姓，把这些地头蛇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旦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连性命也保不成。官僚们只有竭力维护这些大家族的利益，才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贾雨村“暗结虎狼之属”，徇情枉法，谋财害命，鱼肉乡里，弄得“民命不堪”。就是这样一个“贪酷”成性的民贼，在四大家族的保护伞庇护下，飞黄腾达，很快就升为“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成为封建朝廷的军政权臣。曹雪芹这样描画贾雨村的“升官图”，暴露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地主政权和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最高的权力。君权，是地主政权的集中代表。敢不敢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皇帝和君权，这是对封建制叛逆者的一个严峻考验。曹雪芹为了逃避文字狱，使《红楼梦》能够流传于世，不得不在表面上写些歌功颂德的

假话，并再三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并非怨世骂时之书”。实际上，他在小说中喜笑怒骂，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在他看来，皇帝王侯（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等）和“奇优名娼”（如卓文君、红拂、薛涛等）一样，是“易地则同之人”，本无高低贵贱之分。曹雪芹塑造的理想人物贾宝玉，就是个“有天无日”的“混世魔王”，“天不怕，地不怕”的乱臣逆子。贾元春做了皇帝的小老婆，“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受宠若惊。惟独贾宝玉“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文死谏，武死战”，是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贾宝玉却认为“这皆非正死”。正因为“有昏君”，“有刀兵”，那些“疏谋少略”的须眉浊物，为了沽名钓誉，“浊气一涌”，才“送了性命”，轻如鸿毛。另一个叛逆者林黛玉，也曾亵渎过封建帝王。贾宝玉把北静王送给他的见面礼——“圣上亲赐”的“簪苓香串”，转送给林黛玉，她却扔掉不取，还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连皇帝王爷都给骂了。对封建社会最高权威的轻蔑，在富有反抗精神的女奴鸳鸯身上，表现得更突出。当老色鬼贾赦以死来逼她做小老婆时，鸳鸯视死如归，嫉恶如仇，斩钉截铁地发誓说：“我是横了心的。……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这就是说，即使皇帝来求婚，也会同样碰一鼻子灰。如果曹雪芹没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他哪里敢这样尽情地嘲弄皇帝，践踏君权？清初的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到各地巡游，规模的盛大是空前的。康熙搞了六次“南巡”，乾隆也照样来了六次，每一次“盛典”的穷奢极侈，都十分